

全球对话——国际社会学通讯

国际社会学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主编的话

第三期的全球对话扩大了版图，因为有了巴西和日本两组自愿的生力军加入，我们从原本的5种语言增加到7种！透过翻译合作，全球对话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年轻社会学者的社群。本期由访谈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者——日本社会学会会长矢泽修次郎——作为开场。接着是副会长Margaret Abraham向大家报告2012年于Buenos Aires举办的ISA论坛，大会主题是“社会正义与民主化”。此次论坛已由拉美社会学会(ALAS)会长Alberto Bialakowsky、阿根廷社会学会(AAS)会长Alicia Palermo负责筹划，研究协调委员会同意后通过。从拉美的社运观点来看，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当然也可以办在其它地方，像是最近的突尼西亚、埃及)；我们也继续关注世界主义的辩论：Ulrich Beck回应Raewyn Connell、德国Helma Lutz对世界主义的反省、Sari Hanafi探讨“多元普世主义”；此外也有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澳洲、波兰、哥伦比亚、联合国的报导；Jennifer Platt撰写了一篇ISA秘书处的历史回顾，反映了社会学国际主义的下层建筑之变迁；最后Jen Schradie则问道：我们日益依赖的信息科技是否正把世界上某些社会学家排除在外呢？

本期内容

| | |
|-------------------------|----|
| 杰出的国际主义者 | 1 |
| 2012全球论坛 | 1 |
| 辩论 | |
| Beck回应Connell | 3 |
| 从世界主义到公共社会学 | 3 |
| “多元普世主义”会议 | 8 |
| 全球 | |
| 中国：面对经济发展 | 9 |
| 澳洲：何谓经典？ | 12 |
| 波兰：“Scientific Circles” | 12 |
| 马来西亚：环境变迁 | 11 |
| 哥伦比亚：积极介入的社会学 | 14 |
| 联合国：组织犯罪 | 10 |
| 反思 | |
| 历史一隅 | 4 |
| 全球数位落差 | 13 |
| 社会学与社会运动 | 15 |

矢泽修次郎：杰出的国际主义者

矢泽修次郎是日本社会学会的会长，走遍世界各个角落，吸取各地社会学的养分，而这也正是他所强调之“多元普世主义(multi-versalism)”最佳体现。矢泽修次郎在日本教授社会学超过45年，出版过15本书、70余篇文章，于1994到2002担任ISA的执行委员。他长期以来推动在日本举办ISA的世界大会，而2014年此梦想也将实现。Michael Burawoy于2010年12月6日在日本横滨的一间寿司餐厅访问矢泽修次郎，访谈纪要如下：

矢泽修次郎教授，为什么多年来你一直想在日本办世界大会？

因为举办世界大会对于日本的社会学发展相当重要。今年我们自己所办的社会学年会已经是第83届了，所以我们的社会学拥有超过80年的历史厚度；然而，这几十年来我们却没有

(文接第2页)

在Buenos Aires跳一首探戈舞曲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研究副会长



让我们前往Buenos Aires!
很荣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执行委员会将在阿根廷的Buenos Aires举办2012年ISA论坛(ISA Forum 2012) (8月1-4日)！执委会基于公开的原

则，向研究委员会(RCs)、工作团队(WGs)、主题团队(TGs)、国家学会(NAs)等ISA的组织发出招标讯息，期限是2010年11月15日。我们总计共收到了8件的计划书，包括了阿根廷(Buenos Aires)，芬兰(Helsinki)，法国(Paris)，墨西哥(Mexico City)，新加坡，土耳其(Istanbul)，英国(Birmingham)，乌拉圭(Montevideo)。经过谨慎的审查和投票后，阿根廷因其

(文接第4页)

(文接矢澤修次郎)

持续地与国外接触和对话。我们当然引进了很多西方理论，可是这并没有帮助我们自己厘清何谓日本的社会学。

例如，我为国际期刊撰写了介绍日本社会学的文章，可是我找不到一个清楚定义本社会学主题的方式。所以到底什么是日本的社会学呢？或许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可是日本的社会学家也不太清楚本质为何。当然我们引介了相当多的西方理论，而且日本的社会学家也都对于这些理论相当熟稔；此外日本也的确需要西方理论来解释自身的社会。因此，我们必须要结合日本理论与西方理论两者。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这里办世界大会，就是要给日本社会学一个普遍化的方向。这不代表我的努力是一种单一现代性脉络下的普世主义，而是多元普世主义的其中一种意义。

· 你如何解释多元普世主义？

Multi-versality非我所独创。这是Michael Kuhn和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网(World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Network)所发展出来的，而恰巧也是在Buenos Aires举办的一个会议的主题(本期有报导)。而我是支持多元普世主义(multi-universalism)和在地普世主义(indigenous universalism)的。例如，当我们去参加东亚的社会学会议时，我们会发现韩国的社会学家倾向强调韩国社会的国族特性或是历史传统，中国也是。但是日本社会学家就比较着重在欧洲和美国的 sociology，而非自己的传统。受到韩国和中国的影响，我们尝试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普世主义：一种结合西方或美国社会学和日本民族历史的普世主义。

· 在日本有任何抗拒举办世界大会的声音吗？

不，并没有。当然ISA询问在日本举办的可能性已经好几次，我记得从1960年开始已经有3次了，但每一次大多数人都觉得还没准备好，尤其是没有资金来源。所以钱是个问题；然而其它人也会问说办这个会的好处是什么？由于我们拥有一个很大的内需市场，学者可以卖自己的著作并且可以累积自己的名声，即使没有国际知名度也无妨；大家对于国际性的竞争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当我提出要举办国际大会的时候，有些人怪我太崇洋了！我们在国际导向的社会学家和国内导向的社会学家之间有一条很明显的界线，所以这也使得办这次大会的一开始

就得加倍地努力。

· 你一直都是国际主义者吗？

是的。我1942年于银座出生。虽然我很穷，可是有一间专卖外国商品的百货公司就是我的游乐场。每次我去那里，我一定会跑到五楼去看体育用品，特别是从美国进口的棒球配备。我也常跑去图书馆，因为在家很难念得下书。而图书馆总分为成人区和儿童区，我年纪虽小，却老爱往成人区跑，原因是我很爱看书。

· 能不能请你谈谈你的教育背景呢？

我是国中才开始学英文的。我爸有一间专门印英文书籍的印刷店，所以他英文很好，我也因此开始学习阅读英文。高中时，那时是1960年左右，我变得很激进，参加了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社运阵营。但是这个运动在我1962年进入东京大学的时候就没了，而且整个学生运动也都几乎销声匿迹。我们举行了好几次的示威，可是都没什么人来参加，连警察的人数都比我们少！

· 你在大学时念了社会学，而1962年日本的社会学是什么样子？

我想某种程度上那时候的社会学是帕深思结构功能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另外我们也读韦伯、齐美尔、涂尔干。结构功能论和马克思主义很受到主流学者的欢迎，因为这两者都试图解释社会整

(文接第5頁)

编辑委员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编辑: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ò, Genevieve Head-Gordon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e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伦,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庆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Juliana Oliveira Carlos, Andreza Galli

日本: 芝 真里、塩谷芳也、姫野宏輔、高見具広、速水奈名子、岩館豊、池田和弘

西班牙: Gisela Redondo

台湾: 何经懋

新鲜的肾：世界主义理论回应南方社会学

Ulrich Beck, 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

全球对话才出刊没多久似乎就陷入的一言堂的危险之中了。我的论点很简单：我们并不处于一个世界主义的年代里面，而是正在世界化(cosmopolitization)；Raewyn Connell则是质问道：我们可以不要再听到这些北方的论述了吗？

让我先从说明“世界化不是什么”开始。世界化并没有如Raewyn Connell所说的“忽略了19世纪社会学中带有启蒙意涵的普世主义精神”，没有“反映了那些少数特权阶级的经验，然后把自己所看到的就等同于是这个世界新的真实现象”，不是来自于高高在上的某处——欧洲的启蒙理性；世界主义不企图表面地宣称“我们都彼此相互联系着”这样的政治讯息，也不试图把帝国主义和全球权力关系常态化。

世界化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将其与源自于欧洲或以外的哲学和思想史之世界主义(Kant、Hegel、Habermas、Nussbaum、Appiah、Benhabib、Held等人)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世界化无关乎道德，而关乎事实。我想，用以下这个例子来解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新鲜的肾脏。

医学移植技术的成功(而非潜在危机)已让相关的伦理议题退位，并为影子经济打开了一扇大门，提供新鲜的人体器官给这个全球的市场(Nancy Scheper-Hughes)。在这个极度不平等的世界，我们从不用担心肾脏的供货量会短缺，因为总是有人愿意割爱(卖肾、肝、肺、眼珠、甚至丸)。所有人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挣扎，因此，绝望的穷人和绝望的富人，其命运因此纠葛在一起。这正是所谓的“剥削的世界化”；那些被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排除在外的人——难民、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流浪的小孩、非法工人、囚犯、年老的性工作者、走私香烟的人、小偷，等等，他们被一步步引诱走上卖器官这条路；无论在生理上，在经济上，或是在道德上，贩卖人体器官的现象“体现”在穷人与富人的身体中。

如今，现代性的基本伦理议题——身体主权，人类，生命或死亡的意义——在新自由主义与民主人权(选择是无限的)的大旗之下被牺牲掉了，但却没人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过程，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化时代的象征。

(文接第7页)

从世界主义到公共社会学 Helma Lutz,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世界主义是规范性的思想，源自于启蒙时代；此外，世界主义也是一种伦理学的概念，探讨关于正义，民主，人权的内涵。宽容，似乎是实践世界主义的前提，然而仍有其模糊暧昧之处。宽容一方面要求相互肯认(例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建立政治平等，可是另一方面又会成为权力、宰制、排他的工具手段(压迫性的宽容)。于是，争辩的轴线就变成：人们是否要包容所有的文化与族群差异(Joas)，以及到底什么样程度的宽容才合理(Forst)。如此一来，如果我们还是认为宽容是世界主义的前提，那么还是同样的问题：到底世界主义在特定的文化和族群脉络下，意味着什么？

若在民主国家的脉络下，世界主义就不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菁英计划，而必须是由下而上的。Stuart Hall探讨的是后者，并且使用了“在地的世界主义”的概念。这概念从以下一个事实推导而来：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会遭遇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与交际互动。但是Hall也警告我们：文化不是一个被整齐切割、一致、独立的综合体或有机体，“我们的世界并不可很清楚地被划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的反而

是任何一个文化或认同都有其局限性；易言之，每一个



身陷政治风暴的Thilo Sarrazin

人都不是任何单一的群体可以完整表述出来的。尤其在都市里面，各种文化的相碰撞和互影响是生活的基本前提。同时，人们欣赏或接受不同文化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强调或是着迷于那先看得见的差异(习惯、衣着、传统)、认为是一种和自己固有生活模式的距离，

(文接第6页)

(文接在Buenos Aires跳一首探戈舞曲)

低廉的成本和免费的场地而出线。除此之外，其物价低廉，富有地理上的多元性(自从1982年在Mexico City举办大会后就没有在南美办过任何会议了)，加上它属于ISA分类中的B类国家等等，都是我们选择阿根廷的理由。在此，不但要恭喜拉美社会学会(ALAS)、阿根廷社会学会(AAS)及其它协办的机构组织，更要谢谢ALAS的会长Alberto L. Bialakowsky和AAS的会长Alicia Itati Palermo递出申请并提供场地。

让我简短为大家报告一下2012论坛的工作重点:

首先，最重要的目标是举行各个研究委员会、工作团队、主题团队的联合会议，结果将会反映在议程的组织上。筹划者在规划议程方面，在有限的时间下要尽可能保有弹性(议程大纲随后提出)。

主题必须是对于社会有重大意义，要有公共的行动者，以及各地的社会学家都能有所贡献的议题。这对于研究委员会、工作团队、主题团队来说是一个可以从公共行动者身上得到重要启发的机会，也让公共行动者能对论坛主题有所回馈。至于论坛主题已经交由研究协调委员会审议，近期就会公布。

举办暂时的研究工作会议，所有研究委员会的代表均须出席。

研究副会长和当地的筹备委员会共同负责学术议程的规划。

我以研究副会长的身份为大家说明一下举办这次的论坛有什么样的优点：第一，我相信它不仅提供了让不同研究委员会相互交流的机会和场合，也提供了彼此合作共事的契机。会后延伸的讨论和对话也可以让北方和南方的学者一起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在观点和会员的参与上会更加多元，特别是对于那些代表人数较少的群体而言，我们透过选择一个大家都负担得起基本开销的地点和创意地处理语言隔阂的问题，让观点和参与更具全面性。ISA作为国际社会学的主体，则要放更多的

(文接第6页)

历史一隅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出版副会长

图片说明：ISA秘书处成员(左到右)：Juan Lejarraga、Melanie Bloem、Izabela Barlinska、Jose Reguera我相



信每一位会员都很习惯有在Madrid的Izabela Barlinska帮大家处理各种事务了吧。Izabela从1987年起就开始担任ISA的秘书了，然而，这也是历经一番长期人事与地点的变动之后才稳定下来的。秘书处的地点从早到晚分别是：Oslo，挪威(1950-53)、London，英国(1953-59)、Louvain，比利时(1959-62)、Genève瑞士(1962-7)、Milano，意大利(1967-74)、Montréal，加拿大(1974-82)、Amsterdam，荷兰(1982-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全部位于欧洲，而且都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法国虽然并不在上述国家之列，可是法语一直是ISA的官方语言，并且有三个法语国家曾经轮流过。秘书处所在之地皆是每一个国家的大都市，也由于竞争力与非常好的制度上之支持，每个地点都很适合与方便。建立一个永久的会址可以处理更多繁复、专业的ISA事务。

把场景拉回到现在，让我用简短的文字跟大家介绍一下ISA秘书处。Izabela Barlinska是波兰人，她很早就参与ISA了。1978年在Uppsala的世界大会上她是学生研究员，随后在1982年加入秘书处。当办公室迁往Amsterdam后她成为了副执行秘书；然后在Madrid的时候成为执行秘书(并且这段期间她还获得了政治学与社会学博士)。Izabela现在的同事有José Reguera(从1990年开始就负责数据库与网站)；Juan Lejarraga(与Reguera一起工作并且负责帐务、收据、地址更新等等)；Melanie Bloem则刚加入工作团队。之前的秘书处都是同时具有学术职位和兼任ISA的行政工作，所以都是2到3人的组织。其中几届的人都在社会学界享有盛名，例如1950年代的Stein Rokkan(1966-70年的会长)、Tom Bottomore(1974-78的会长)。虽然规章制度规定秘书处不能进入执行委员会，不过有些人还是在秘书处担任要职。 ■

(文接矢澤修次郎，第2頁)

体。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共产党相当有影响力。当然也有其它的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流派。那时候甚至已经有葛兰西著作的日文翻译。也因为如此当我再1973在St Louis的Washington University参加葛兰西的第一届国际研讨会时，我变成了一位老师，去教那些不知道葛兰西是谁的美国学生。



沈思中的矢澤修次郎

· 所以你拿到了社会学博士？

很不幸地，那时候写博士论文未成风气，虽然后来大家都会补写。到1980年晚期，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还只有写过硕士论文而已。我则是钻研社会学与实用主义，想知道美国帝国主义的特征为何。你也知道，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引进了西方理论，以致于日本人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了帝国主义者。大家都误会了西方理论，所以我决定把实用主义看成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我主要研究William James和John Dewey，并将这两者与Charles Sanders Peirce放在一起比较。于是在知名的日本帕深思权威Tominaga教授的指导下，我讨论了结构功能论和实用主义的关系。

· 所以你深深地浸淫在美国社会学里面？

噢，对！而我也再硕士毕业后到Washington

University进修了3年。因为我有拿到Fulbright奖学金，所以很自由自在地听我想听的课。另一方面我也想参加一些美国的社会运动。例如我就参加了一个抗议一间剥削劳工的酒厂的运动，还是工会运动的成员。我认为若要深入了解社会的话，那就要研究社运。

· 你后来也和相当激进的Alvin Gouldner共事过？

是的。但问题是Gouldner虽然看似进步，可是他却不参与社运。他激进的是理念。我有参加他的讨论课，其中印象很深的是关于如何写博士论文的。他以他自己的两本书作为例子：Wildcat Strike和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 你回到日本教书之后是怎么实践你的激进社会学的？

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听众，而学生运动也没落了。我虽然写了很多书，很多文章，可是并没有衔接理论与实践。所以多数时间还是在校园内。我在津田塾大学教女学生，在一桥大学教研究生。他们其中很多人后来都在日本，甚至美国教书。

· 你仍然认为你是激进主义者吗？

噢是啊！我一向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始终是个社会学家。

· 你依然觉得现在的美国和过去帝国主义时期一样强大？

当然。帝国主义一直在变，从帝国主义变成帝国(笑)。美国霸权仍然屹立不摇。但美国也有好的一面，像是美国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人文主义代表性的事件。所以在这点上，我喜欢美国人民，可是并不喜欢主流的美国政治人物！我也不喜欢主流的社会学(笑)！

· 你认为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吗？

某种意义上是。的确，如何超克日本的帝国主义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二战后我们其实有大好的

(文接第7頁)

(文接在Buenos Aires 跳一首探戈舞曲，第2頁)

心思在以民族国家、地区、公民身份、族群、种族、阶级、性别、语言等为基础之权力或特权的来源上，因为这些因素都形塑了知识生产、信息传递、研究扩散的面貌。这次在Buenos Aires的ISA论坛对于增进区域的多元和拓展社会学视野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步。

第三，可以提供年轻学者更多参与国际会议、和前辈交流合作的机会。这向来是一件重要的事，而且我希望2012年的论坛可以有一个特别的场次让年轻人和前辈齐聚一堂。

第四，透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激发出在地、国家、跨国、全球的政策制订和实践，进步一连结社会学者和社运者，一起追求社会正义。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社会学家抱持着坚定的信念投身于学术研究，一边扎根在社会学，一边从其它学科获取灵感。解决诸如贫穷、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全球不平等、生态恶化、战争、民主倒退、危害人权等

问题的挑战和可能性，正式ISA可以发挥的议题，并且可以进一步接合社会学和公共领域。如此一来，ISA论坛又再一次提供了绝佳的平台，让社会学家可以进行全球性的对话和信息交流，并且这些都将会带来转变。

选定落脚在Buenos Aires举办论坛是个好的开始，不过未来的一年半还有很多事情尚待我们去完成。藉这个机会也要感谢那些提出申请计划书的国家愿意为ISA开创新的可能；谢谢会长Michael Burawoy、研究协调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共同确保选择过程的客观与公正；特别谢谢Izabela Barlinska在征求计划这方面提供了文书和协调上的帮忙。这次论坛将有无限可能。论坛的成功不仅将有赖于在好的议程筹划，也将奠定在这个国际社群中每一位学者、政策制订者、运动者、公众思索我们这个时代重要议题的努力之上。 ■

(文接新鲜的肾)

在被世界化的(cosmopolitanized)身体上，是来自那个大陆、种族、阶级、国家、或宗教已经无关紧要。穆斯林的肾脏可以净化基督教徒的血液；白人种族主义者可能需要黑人的肺才得以存活；金发经理人的眼睛可能是来自于非洲街头的某个小孩子；世俗亿万富翁的肝脏可能来自于巴西贫民窟的一位信仰新教的性工作者身上；有钱人的身体可以被拼凑起来，但是穷人的身体却被切割得少东少西的、使得后遗症缠身一辈子；更重要的是大家还认为这是出自于穷人的自由意志、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好。贩卖器官于是变成了保险合约的一部份。另外一方面，新的“生命政治的世界公民”(bio-political citizen of the world)俨然浮现——白人，男性，胖的或是匀称的，再加上印地安人的肾、或是穆斯林的眼睛。总之，肾脏绕着地球跑，并遵循着资本的流动路径，从南到北，从穷人到富人，从黑人到白人，从女人到男人。女人也从来就很少接受器官移植。由此可知，这个世界化的年代，世界被分成一边一国：卖器官的一国 vs 买器官的一国。这个世界化的年代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人人共享的世界，一个不再有外面、不再有出口、也不



器官移植：世界化的象征

再有其它人的世界。不论我们如何聪明敏锐的批判北方的叙事、忽略了南方叙事，都必须承认：大家都住在一个彼此相互纠缠、矛盾复杂的“风险社会”中(Beck, 2009)。放弃那个人人自主、且能置身事外的梦想国度吧！也放弃那个清楚二分北方与南方的地理学种族主义了吧！

我所说的是北方理论，抑或南方理论？不，我说的，既属于北方，也属于南方。然后，用社会学的分析，系统性的把两者的矛盾观点结合，则正是“方法论世界主义”的精神。

至于新鲜的肾脏呢？他们是例外吗？不是。世界化的过程影响且转变了世界上的中介制度，像是家庭、家人、阶级、工作环境、劳动市场、村落、城市、学校、科学、公民社会运动、一神论的宗教等等。它们存在于这个多中心的世界，伴随着日益增加的移民特质，并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边界里面。世界化的过程也包括了气候变迁、全球金融海啸等。例如，被世界化的全球家庭(global families)同时体现了似乎合理的悖论：远距离的亲近和全球性的矛盾。并非所有的家庭都体现了所有的矛盾现象，但是某些家庭倒是体

(文接第15頁)

(文接矢澤修次郎，第5頁)

机会去克服它，但很不幸以失败收场。我们有的是一种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是在东亚的霸权。多数的日本人不太和外国人沟通，而且对中国感到愤怒，特别在中国崛起之后更是如此。虽然看似合理，可是实际上这出自于日本人的自我优越感。

· 这会不会只是民族主义而已？

这比民族主义还多。日本人强烈地渴望回到一次大战前那种以天皇为基础传统的文化系统。甚至有些自民党的政治人物强调天皇系统的重要，认为若没有天皇，那就不可能推行道德教育、社会整合、甚至社会进步…等等。这种想法深深地潜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实际上，在面对全球化，日本人的家庭规范、群体规范、意识形态等所有建立在日本现代化基础之上的制度都运作地不太顺利。他们在全局化中迷失了方向。作为社会学家应该要为社会的未来提出一个新方向、新蓝图才是。

· 你好久以前就开始参加ISA了，对吧？

没错。我参加1982年墨西哥的大会，那时我受邀

出席全体会员场次。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无役不与。日本和ISA有很特殊的渊源。Odaka教授是我再东大的指导教授之一，也是ISA的创始者。虽然他是一位自由派人士，但是政争期间他很难表达意见。战后他了解到国际关系的重要，于是到1960年代末其它都会参加ISA。在他之后Watanuki教授成为ISA的副会长，所以某个意义上我是Watanuki的后继者。

· 从你30年前开始参加大会开始到现在，你觉得ISA有些什么改变？

它一直在变。ISA有三大支柱，第一就是研究委员会；第二是国家学会的成员；第三则是个人会员。到1990年代中期研究委员会都还是ISA最主要的部分，而之后国家学会就越来越举足轻重了。所以现在研究委员会和国家学会结合得很好。另外ISA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和兴趣去发展全球社会学的组织，所以，我们更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智能。 ■

(文接從世界主義到公共社會學)

有些人则关注在相似性上，关注年轻人、女性、或是母亲等群体的共享经验。实践上，世界主义是一种协商，去协商一种差异与平等之间的妥协。这种协商不会一劳永逸，而会不断继续；这种协商不是平静祥和的，而是充满争议、吵闹、疲惫的过程。

让我用我的城市Frankfurt来做为例子吧。去年，当准备要改变政策方向之际，Frankfurt负责族群整合的首长Nargess Eskandari-Grü nberg采用一个关于族群整合和多元的新概念，并在网络上举办了上百场的激烈辩论，Frankfurt居民中能参与的都参与了。2010年10月底有47,000人参加。如此讨论的目的在于要让居民去思考：如何避免总是让移民及其后代被社会孤立，以及如何更重视每一个人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需求。据我所知，这在德国是空前的创举，政治人物也因为倾听、承认、甚至挑战居民的意见而受到许多人支持。

可是这发生在Frankfurt的例子，在德国也不是天天都在上演。德国央行(位于Frankfurt)的一位著名的理事Thilo Sarrazin出版了一本名为“德国要作自己”(Germany Does Itself In)，这在2010年的夏天引发了很大的争议。Sarrazin在这本书中描绘了一个德意志民族(Volk)不复存在的未来德国，并宣称福利制度的

受患者和穆斯林是造成此结果的始作俑者。就像恶名昭彰的“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中把社会问题都归咎给非裔美国人的基因一样，Sarrazin把矛头指向德国边缘族群的基因。两本书都用广泛的统计资料、纯科学的方法证实了部分的结论。

虽然Sarrazin的观点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本书所呈现的方式却大大影响了德国人彼此沟通交流的氛围。Sarrazin已经置身在辩论民族国家和在地相关议题的核心战场之中。他的书销售好几百万册，是全国卖得最好的，而且全国的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谈论。媒体亦是宣传这本书的要角。Sarrazin是位社会民主党员，也是前Berlin的财政事务部长；他形容自己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敢说真话，不畏惧政治禁忌，不向政治正确屈服，不怕碰触移民问题(特别是土耳其和阿拉伯的移民)。

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些未被言明的宣称：

· 政治人物和政府距离人民太遥远。政府的决策并没有取得众人的共识，也并不关心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德国社会在文化上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而威胁来自于

(文接第8頁)

“多元普世主义”：新的典范？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执行委员

甫成立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网”(World SSH Net)、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拉美及加勒比海国际教育机构(IESALC)、阿根廷科学委员会(CONICET)共同举办了一场为期3天的工作坊(2010年10月28-30日),地点在拉美社会科学院(FLACSO),主题是“社会科学和学术界中的文化——建立科学的多元普世主义(multi-versalism)所面对之认识论和教育的双重挑战”。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在Buenos Aires齐聚一堂,讨论人们一方面越来越重视全球性的知识分享,另一方面现今的排他结构之下,许多的知识生产过程却是一个黑盒子;那么共享知识的需求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多元普世主义(multi-versalism)是相对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概念。它和南方那些相信普世主义而默不作声的学者相反,而是一种思考普

世主义之限制的方法;不同于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对立,多元普世主义寻求北方和南方学者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转译;它承认结构的依存性,但同时也试图与之对抗。工作坊的与会学者都知道社会科学正在跟随着国际化的潮流,所以很努力的想办法如何让这股国际化趋势能更有文化的敏锐度,能承认知识其实原自于各种不同的系统,例如,地方知识也是其一。World SSH Net的会长Michael Kuhn在开幕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以全球的多元诠释观点来取代欧洲的普世主义。他检视了西方思想霸权中的本质与机制,然后提出了World SSH Net未来的工作重点,包括了:(1)掀开社会科学知识中的认识论预设;(2)检视整合在具有政治意涵的分类与理论之内的社会模型;(3)发展出一种全球视野的方法论,将社会科学从那些政治性的特殊主义中解放

(文接第9页)

(文接從世界主義到公共社會學,第7頁)

伊斯兰教。

· 移民不属于德国,他们只是暂时的居民。他们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团结和民族的认同来说,是个问题。

许多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都支持Sarrazin的观点。这些人倒不一定支持他的生物基因论证,而是认为政治正确限制住了移民议题的讨论,以及多元文化不过是那些造成问题的左派和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的一相情愿。这些人的看法为Sarrazin的书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然而也有其它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持反对意见。社会民主党开始要把Sarrazin排除在政党运作之外,要德国央行让他提早退休进而退出理事会。不过更有知名的政治人物、女性主义者、科学家、艺术家支持批判伊斯兰教。总之虽然各种不论支持还是反对的声音都有,交错复杂,可是大致上的气氛还是愤怒的,而且情势越来越紧张。极右派很明显地从中获利,而且整个辩论越来越难容得下理性思辨。那些挑战Sarrazin的言论即使提供了很多研究证据来支持,但是在这场论战中已经败居下风。愤恨的情绪已经蔓延开来,就算魔法师来也难平息众怒了。

那么,这场关于多元文化的辩论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作为社会学家,我觉得这样的辩论很有趣。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研究问题,观察政党的作为,分析媒体报导,

描述媒体之间的战争,或是把此事件的后续结果写成文章或书。这也是在实践韦伯所谓的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尽可能价值中立去描述社会现象。然而,还有另一种社会学——曾经被称为基进社会学,现在则称为公共社会学,由下而上将公民社会和行动者连结在一起。Adonor和Frankfurt学派的其它成员可视为是这个传统的先驱。从公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要介入这场辩论,因为这场辩论已经把公开和有尊严的沟通扭曲了,而且某些特定的群体在其中变成了民粹动员的代罪羔羊。

因此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就是为那些沉默的人——那些不论是不是移民,那些在一起工作、学习、活动的人,那些是跨族群后代的人——创造一些空间,然后我们一起参与公共事务。若我们想保证人人都能相互尊重(学生也会更有竞争力)的话就必须这样做。学生一定有受到这场辩论影响,所以我所恳求的无宁是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是一个对话:让这个会影响到学生、老师、银行家、政治人物、出租车司机等的辩论,可以以Adorno的问题:“如何无惧地与差异共处?”(“Wie kann man ohne Angst verschieden sein”)为核心出发点。这样的努力或许很艰难,但绝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将会消弭仇恨,迈向真正由下而上的世界主义。 ■

(文接多元普世主義，第8頁)

科学实作与日常生活知识”：Charles Lindblom (美国)、Bent Flyvbjerg (欧洲，丹麦)、Catherine Odora Hoppers (南非)。每种意见都关心社会科学研究实作的内在关系、研究所生产的知识、知识的运用。

其它的参与者则提供了田野的研究个案：韩相震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Beck的“风险社会”概念如何在南韩的研究中以由下而上文化诠释方式被实作。南韩所面临的风险是来自于快速现代化导致的道德崩解，而在此一脉络下，研究者必须关注儒家思想中的规范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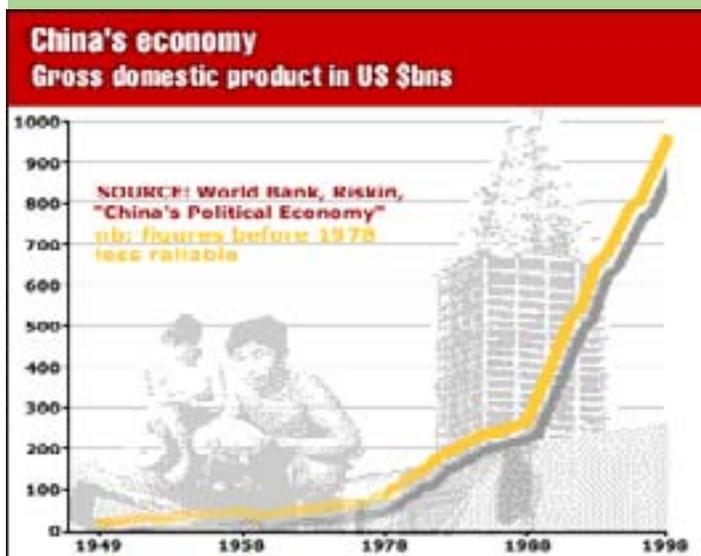
Nestor T. Castro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则认为菲律宾教育体系偏好西方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对于菲律宾来说未必适用。举例而言，教导学生要区辨“自我”与“他者”的不同，然而如此一来，要怎么去描述菲律宾语中的“kapwa” 这个字呢？此字意味着“在他者中的自我” (the self-in-the-other)，意即是互补的一对，例如，一种针对他者的团结。所以，他很强调社会科学教学中多元普世主义的重要性，因为社会科学中概念的来源相当多元；Kazumi Okamoto (Knowwhy Global Research) 也聚焦讨论西方的社会科学霸权。他透过日本学者在与西方学者对话时所遭遇的困境 (特别是当有学术上的歧义时) 来说明此现象；Tania Pérez Busto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柬普寨) 也同样关心这个议题，指出科学与科技中共同预设的男性中心主义；Nese Karahasan (University of Ankara) 则探讨过去20年来文化因素如何形塑了土耳其的社会学发展；I Ketut Ardhana (Udayana University, Bali) 为大家介绍印度尼西亚的文化研究；Carmen Bueno Castellanos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 Ciudad De México) 除了简介墨西哥的社会人类学之外，还呼吁北方和南方不但在学术上要平等合作，在商业、国际组织、NGO等的交流上也要如此。

会议上也讨论了科学知识如何纳入原住民的知识系统。Michael Christie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澳洲) 说明了他的大学和原住民社会合作的经验。多年来研究者 (包括了原住民的共同研究者) 致力于将数字科技和社区永续发展结合在一起，传统知识的代间传递，以及传统知识在大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应用；同样地，César Carrillo Trueb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文接第13頁)

中国社会学正面临快速经济发展的挑战

李培林，中国社会学会长



图片说明：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经济成长

中国社会学学会2010年的年会主题是“中国道路与社会发展”，其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这段期间，中国历经了政治动乱、经济震荡、SARS、地震、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虽然如此，中国还是保有高度的经济成长和快速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来自30个省和亚洲其它国家总计约600位的社会学家在哈尔滨参加这场年度盛会。除了大会主题之外，另外还有23个特别论坛。中国社会学社群不论在人数上或是在议题上都正在快速扩张当中。

最近的金融危机和欧洲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使得国际的发展日益复杂。一方面全球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迅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相互依赖也越益增加；另一方面人类也面临了许多新的挑战，例如资源分配、生态环境、不平衡的发展、区域冲突、金融安全。如何在这个复杂万千且快速变动的环境中维持和谐和持续发展，以及如何确保国际社会的秩序与稳定，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且真实的课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迈入了崭新的阶段。发展的模式的改变、城乡差距的削减、区域

(文接第10頁)

(文接中國社會學正面臨快速經濟發展的挑戰)

发展的协调、加速的社会建设等议题是此新阶段的重点。中国现在正在执行第12个5年计划。下个5年将会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将带领中国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改革开放30年也让中国社会学迈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阶段。过去30年来快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提供了中国社会学发展肥沃的土壤。此外，中国社会学也帮助中国建立了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社会学家谨慎地观察并分析社会现象，针对社会问题提出解答，持续累积学术知识，并建立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

快速的经济成长也使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譬如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贫富不均、地方债台高筑。许多中国社会中的现象并无改善，像是公共教育、劳工

保障、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协调的城乡差距。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许多校园和幼儿园的社会报复性杀人喋血事件、工人罢工、工人自杀等。社会学家应该多注意这类问题才是。

因为我国的快速成长使的中国社会学在国际间日受重视。我们和美国、法国、俄国、印度、巴西、日本、韩国建立了合作关系，也开始发挥国际影响力。

各位学者，中国拥有绝佳的机会，也将面对未来10年的大转变。我希望你们可以一起加入，掌握这个机会，一同研究与改革发展有关的议题，帮助年轻学者成长，进行社会调查，为社会学的历史留下更多更好作品。现在，我在这里宣布：中国社会学会正式对外开放！ ■

联合国与组织犯罪

Rudolf Richter, University of Vienna



偷渡

作为一位观察员，我参加了第五届“联合国对抗跨国性组织犯罪公约”之缔约国会议。会议在2010年10月18-22日于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目的在于提供平台，让缔约国报告打击跨国性组织犯罪的执行状况。

从经济角度而言，跨国组织犯罪肇因于大量的金钱流通。在一场简介演讲上，讲者说每秒非法交易的金额是20万美金，因此，有一点很重要，对于此事世界各国立即展开辩论。会议之后各国达成了普遍的协议，强调跨国合作的重要性。其中之一便是阻止利用银行账户的犯罪行为。此外，个别的议程包括了：审查各国对抗跨国犯罪的成国；关于人口贩运的协议；关于走私与偷渡的协议；关于军火的协议。

整幅图像相当分歧复杂。例如，非法交易可能也有好的一

面，像是协助难民逃难、帮助移民获得更好的生活。更进一步，也有人认为类似的交易应该合法化。对于罪犯来说，偷渡是个高报酬、低风险的买卖，但国际社群试图要把这类交易的风险增加。相反地，军火交易绝对是负面的。此外，新型态的犯罪，例如网络犯罪或是器官买卖等也必须列入条约中。

全体出席的场次中讨论了组织犯罪的评估，这个部分受到获选会员的监督和充分的数据左证。有些国家匆忙地执行评估工作以呈现其工作成果；有些国家并不积极实行、担心成本问题。因此，资金是个问题，北方国家应该给南方提供援助。

与会众人皆同意要搜集资料，并藉助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里专家使用的工具，然后分享彼此的经验(比只是给建议好)。新的NGO已经可以参加，他们将不再只是观察员，这点强调了公民社会的重要。另外他们提供一种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去建立一套提供补偿、援助、自主结社的标。

对社会学家来说重要的议题是数据的收集，而社会学家可以协助搜集到质化或量化的数据。量化研究可以藉由透过增加国家或个人的个案而臻至齐全。此外，社会学家也可以和公民社会的组织合作，协助训练律师或行政人员。

对于这项议题有兴趣的人请参考：<http://www.unodc.org/unodc>；欲提供意见者请前往：<http://www.unodc.org/unodc/en/ngos/news.html>。 ■

社会学和环境变迁：马来西亚报告 Ruchira Ganguly Scrase, 亚太社会学学会会长

2010年12月在马来西亚的Kota Kinabalu举行了第10届亚太社会学(APSA)年会，由University of Malaysia, Sabah (USM) 和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UOW)协办。大会主题是“社会与环境变迁：亚太的机会与挑战”，并吸引了大批的平面和电子媒体的大幅报导。社会学家向来没有伟大的公共形象，但是这次有些学者接受了访问，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让全世界了解我们学院以外的面貌。

主题演讲者是Datuk Dr. Shamsul Amri Baharuddin 教授

(Founding Director,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ISA executive member Emma Porio教授(ISA executive member, Professor of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Chris Chong Chan Fui (在Sabahan出生的电影导演和视觉艺术家)。Porio教授的演讲主题：“社会与环境变迁：社会学与社会学实践的机会与挑战”激起了很热烈的响应与讨论。过去虽然也有知名电影导演或记者参加APSA，但是这届还是头一遭放映得过奖的年轻导演所拍摄之纪录片。导演Chris的纪录片“Dis-location”获得了与会人员的多数好评，促使我们开始构思把纪录片放映纳入正规议程，况且有越来越多学生和年轻的研究

者对于媒体社会学产生兴趣。

来自15个国家、约150名社会学家与会。而且很令人振奋的是有来自欧洲、研究亚太议题的学者来参加；与会者也包括了很多学生，他们提出了新颖

的观点与挑战主流的社会思想。

私底下与大会代表言谈中得知这次大会相当成功，每一位参加者都觉得宾至如归。在APSA AGM的部分，前任研究生代表Nichole Georgieu刚送出博士申请；而Briekena Qafa-Osmani则是新的代表，一位阿尔巴尼亚人，是



ISA执行委员Emma Porio在APSA年会演讲

马来西亚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的社会与人类学博士候选人。除此之外，秘书处无其它人事异动。

APSA的传统重头戏是大会晚宴。当地的Kadazan舞者为与会带来很精彩的表演，特别是Scott Baum教授(APSA的秘书长)，他让我们见识到了他高超的舞技。总之大会相当成功，人人尽兴。下次的年会已经开始筹划，时间与地点则尚待公布。 ■

澳洲社会学年会快讯

Dan Woodma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0年12月6-9日澳洲社会学会(TASA)在雪梨的Macquarie University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会,由“社会学益智问答”(sociology trivia night)开场,如此一来大家对于TASA的秘辛都有更深的了解(尔后在



博士生Justin Lu從TASA會長Michael Guilding手中獲頒獎項

ISA的场合上遇到澳洲学者时谈话可得要注意啦)。我的团队(几乎由TASA的Sociology of Youth Thematic Group组成)得到第二名。大家都知道第二是最理想的名次,而也由于澳洲重视平等的优良传统,第二名跟第一名一样可以领到奖品—四瓶白酒!

开幕主题演讲由Syed Farid Alatas担纲。Alatas教授的主题以近期TASA的会议中围绕在Raewyn Connell教授对于“南方社会学”呼吁的争辩为主,进一步阐述非西方的理论如何和西方的“经典”作品对话。第二场的主题演讲中, Mary Holmes讨论了当代主体中情感(emotions)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们如何可能反身性地利用情感去形塑其日常

生活。最后一场演讲, Raewyn Connell、Jack Barbalet、Michael Gilding三人共同质问:“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已经山穷水尽了吗?”他们认为,把什么现象都归因于新自由主义,会使得社会学变得很懒惰;况且新自由主义也未必能精确捕捉当代资本主义运作的内涵。然而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同意若社会学家过去觉得这概念不恰当,那么当初就应该发明新的。

其它的场次也很精彩。我参加了以Sociology of Youth stream这个大主题为主的讨论,其场次多到快满出来了,并且其中的辩论既温和又激烈。同时段的场次也是一样的情形,每场都一位难求,甚至可以看到迟到的长者还必须站在会场门口的情况。有些人还开玩笑说,没有座位的教授们应该尽可能地装老装弱,好让那些年轻人让位给他们。

可是我的印象里面好像关于澳洲社会学之当代或是未来的危机(crisis)相关议题,着墨并不多。发表人似乎对于近年来澳洲

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都抱持着很正面的态度。会如此地乐观,可能是因为大家多了一份自信——在澳洲的公共领域中社会学家的发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但也越来越被重视;也可能是因为有些社会学系所录用了新人、扩大了规模;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情况似乎没那么糟吧(和那些远渡重洋来参加会议的英国学者比起来)。

最后,虽然校园里的酒吧都在放暑假没开,整个年会的气氛依然非常融洽,许多的讨论都从早持续到晚,适合社交的场所就在附近,店家每年也都会被告知会有大概15人左右的社会学者(一群温和、半夜3点就会被护送或是撵出酒吧的教授)去消费。我的同事Ani Wierenga建议明年的年会应该颁一个奖给分析类似“保镖—学者”经验的论文(甚至是回忆录)!明年大会将在11月底于University of Newcastle举行,主题是“在地生活/全球连结”(Local Lives/Global Networks)。Newcastle位于距离雪梨2小时车程的海岸线,旅游圣经Lonely Planet称之为2011必看的城市之一。各位同事们,若资源条件允许的话,明年肯定是来参加TASA年会的好时机! ■

Scientific Circles: 波兰年轻社会学家的计划

Tomasz Kukulowicz, University of Warsaw, Lukasz Srokowski, University of Wroclaw

Scientific Circles是波兰社会学会(PSA)的一个小组,参与者约有来自15个大学的100名学生。其命名的灵感来自于波兰很受欢迎的一种社团形式: scientific circles。这些组织所诉求的是学生的学习要超越学校的必修课范围,而典型的类似活动包括了: 举办科学类的会议、讨

ISA连到了谁？社会学家与全球数位落差

Jennifer Schradi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卡片目录、打字机、微缩胶片…等等，这些都是曾经是学术领域的重要科技。如今，社会学家多半依赖Jstor、笔电、EndNote。然而，大家知道南方的(global south)社会学者使用什么科技吗？

在1990年代关注数字落差议题的时候，学者感兴趣的是检视上网与没有上网的人之间的数字差距。但是日新月异的科技使用激发了相关的议题，例如数字活动的阶层化、技术水准的差异、科技资源等等。有些学者(如Ono and Zavodny 2006)比较不同国家的上网率，可是鲜少讨论在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数字差异为何。例如，对于ISA来说，数字不平等可能会影响到沟通的方式：网络上的合作可能不能解决那些来自于资源较为贫乏地区的社会学家无法参加国际会议的现实问题。

我们试着解读下列的资料来指出ISA的会员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首先，ISA把会员分为A、B、C三种。美国和英国是拥有最多会员数的国家，他们在2008年的平均上网率是76%。同时A类的国家，虽然我们无法取得资料，但是可以推论他们也同样有很高的上网率。另一方面，C类的国家，如印度和奈及利亚，上网率分别只有5%和6%。

但是，不管国家的上网率为何，都不能代表社会学家的上网率，更不能解释他们上网都在做什么。举例而言，一位奈及利亚的社会学家可能具备基本上网功能的计算机，可是他的学生却没有；或是要花大把前买设备；或是没有最新的软件去跑分析或写论文(Endnote、Stata、AtlasTi)；也可能看不到Jstor等在线数据库。

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Philip Howard称这种现象叫做知识落差(intellectual divide)。在The 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2010)这本书中他研究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家，发现在发展程度较少的国家中，学术受惠于国家制度的领导人。在这些国家中，最先进快速的计算机社会都位于主要大学的图书馆中。但这取决于大学或图书馆如何分配、利用这些资源。这意味着能够提供国家最多帮助的大学就会得到较多的资源。结果就造成了学科不平等。

社会科学总是处于最低的地位，所以也就不能使用各式各样的期刊。纵使社会科学已经有那么多期刊，然而工程和公共健康类始终有使用的优先权。因此，有些社会学家并无法阅读到期刊。

什么样的数字障碍是你或是你的学生所面临的？ISA现在对于这样的议题很有兴趣。若有任何问题请联络我：Jen Schradie, schradie@berkeley.edu 并附上你的国家、职位、以及学术单位。

References

- Ono, H., Zavodny, M. 2007. Digital inequality: A five country comparison using microdat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ume 36, Issue 3, September, Pages 1135-1155.
- Howard, P. 2010. *The 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I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 | 美國 | 英國 | 巴西 | 南非 | 印度 | 奈及利亞 |
|-----------|-----|-----|-----|-----|-----|------|
| 上網率 | 76% | 76% | 38% | 9% | 5% | 16% |
| ISA 經濟體分類 | A | A | B | B | C | C |
| ISA會員數 | 704 | 289 | 176 | 157 | 249 | 134 |

(文接多元普世主義，第9頁)

出来。

工作坊的讨论没有打高空，而是研究具体的经验个案。因此，Hebe Vessuri (Venezuel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建议大家的讨论观点从“科学的文化”转向“研究的文化”。依Bruno Latour的观点来看，科学是冷静、中立、抽离的，而研究是温和、介入、冒险的；科学试图结束人类的争端，研究则开创各种争议。此外，科学为了追求客观，努力尝试要避免意识型态、热忱、与情感的枷锁；但对于Vessuri来说，研究和社会已经彼此纠缠缠绕，密不可分，而且，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也是在经验这个社会某些有趣的变迁。对话、比较、转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标语。

与会者也都同意承认人类经验多元性的重要性。Chris Caswill (University of Oxford) 借着检视三个大陆来的三种不同声音去理论化所谓的“社会

(文接第16頁)

(文接Scientific Circles第12頁)

论、与“有趣的”人座谈、执行小型研究案、或是偶尔出版杂志书籍。这些活动得到的资金赞助并不多，有时甚至没有赞助。

PSA的Scientific Circles小组在2004年由一群硕士与博士生成立，其理念是希望可以结合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年轻社会学家，共同组成一个论坛，彼此交流切磋。PSA(特别是前任会长Włodzimierz Wesolowski教授)向来很欢迎并帮助学生举办活动。随着越来越多人参加这个小组以及有越来越多的新计划，Scientific Circles在PSA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这个小组在过去3年来最大的计划是“移动工作坊”(Moving Workshops)，目前为止定期举办6个会议，并有125位学生、25位年轻学者的参与。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大家都观察到一个现象：从学科角度而言，每所大学的社会学都不尽相同。这个工作坊为期2天，来自各地15至30位的学生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其一的Scientific Circle负责组成会议并邀请其所属大学的学者，然后把讨论聚焦在一个主题上，涵盖理论的介绍和实际的研究操作，然后通常会执行一个微型的研究，由学生收集经验资料，之后与教师们讨论并进行分析。

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坊最有趣的一次是2009年3月在



PSA會議中的社會學生力軍

Poznan的主办的那次。这场的主题是日常生活社会学以及物质文化。在开幕演讲中简短介绍了Poznan的社会学历史，认识到了Poznan University第一位的社会学教授：Florian Znaniecki，也了解了该大学战后的历史。理论的部分

则包括两场演讲：Rafal Drozdowski教授说明了为什么日常生活社会学现在除此热门的9个原因；Marek Krajewski教授则介绍以物对象的研究，认为人和物的关系是对称的。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讲者都是该领域的佼佼者。至于实作的部分，学生则以4人为一组分别去作田野，搜寻常见与罕见的事物。他们使用小型相机和

录音器材走遍Poznan的各个地区，然后回到Poznan University报告结果。讨论之后发现，某些事物之所以被归类为不常见的，是取决于人们对于情境的社会性定义。

Scientific Circles带给PSA一项额外的副产品：年轻社会学领导者学校。此计划想要养成年轻学者关于组织管理、沟通、协调的能力，每年训练4到5周，并在不同的城市实习。如此一来年轻学者就可以彼此见到面，进行交流。虽然这个计划并非正式属于PSA之下，但是几乎从这里结业的100为学生之后都参与PSA的Scientific Circles，并相当热心的投入参与，贡献所学。 ■

速写哥伦比亚的社会学

Ana Lucía Paz Rueda, Icesi University

在哥伦比亚有15个社会学系所，其中6个在私立学校，9个在公立学校。1959年社会学刚诞生，特别关注农村、政治、社会变迁、与国家。几十年下来也开始关注都市、工业、文化等议题。为了分析民族暴力与社会分裂的问题，哥伦比亚的社会学也开始需要新的方法，包括“参与行动研究”。1969年的一场政治危机导致了社会学“大理论”(grand theories)的巩固。

1990年，随着新的社会学系所的设立，这门学科重新诞生了。接下来的15年，社会学系所从5间增加到15间。多数都在人文与社会学院内，这间接鼓励了跨学科的交流。这些系所之中，60%是需要修业10学期的，40%需要8学期，平均需要155个学分。将近半数的系所强调实践与社会参与。专业化则是围绕在社会转型与分析、解答哥伦比亚的社会问题之上展开的。

哥伦比亚也有22所的研究中心有包括社会学领域，其中大约75%附属于公立大学。社会学的训练着重

在方法论(25%)、跨领域(25%)、社会议题(18%)、理论(15%)。方法论课程质化与量化并重。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管理与社会政策的课。理论课特别把重心放在马克思、韦伯、涂尔干(15所之中已有9所开授)。

上述简短的介绍显示出了哥伦比亚社会学经历了长期的变化，并且正面临挑战。越来越多的学术单位采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从事研究，代表了其成长的潜力。此外也至少有3个领域尚待加强：(1)国家性的公共议题辩论：经济、正义、公共文化的建立；(2)对于那些可以捕捉到新的社会脉动之系统性视野，要特别关注；(3)思索如何才能碰触到人们的实际生活。我们也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够让不只是社会学同侪能够了解，还要让立法者、社会行动者也能读得到的沟通交互方式。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能够想象并接合这些人的学者——一位不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能够直觉地辨认这些人、并邀请他们加入对话的社会学家。 ■

(文接新鮮的腎，第6頁)

现了其中的一部份。就像移民家庭里常会出现中心与边陲的紧张矛盾一样，那些来自两个国家的婚姻、父母、情侣等可能体现了两个国家的紧张，或是主流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用全球家庭和远距离亲密来思考去重新思考传统智慧，以及发展一个强而有力的论述：远距离的爱及其矛盾；这也反映出了一种国家精心策划并载明于法律中的无知状态；我们进一步可以知道远距离的爱和全球家庭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之中，文化创伤——一种对于历史上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全球不平等至今仍然挥之不去的忿忿不平——始终存在且会持续下去。

此外，母职也在世界化。医疗化的生产过程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美丽新世界：捐卵者，或是代理孕母；（让我们带入公式）“我妈是一位西班牙的捐卵者”或是“我妈是印地安的代理孕母”；再一次我们看到生物科技操纵的全球不平等镶嵌进了人类的身体与认同里。

难道这不是一种世界化的论述？难道这不是新版本的旧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就像Stuart Hall的经典名句：“我们只是英国人喝茶时所加的糖罢了。”连续性和差异性一直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厘清与承认。世界化的观念必须摒除在那些全球化论述中司空见惯的“空间偏见”，并且要对于当今文化创伤的历史源头有所察觉。但后者，也是一种当下对于未来的期待，一种反身的现代性，因为，结合了通讯与医疗科技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取得胜利，侵蚀了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国家的制度与二元性，像是国家/国际、我们/他们/、核心/边陲。我们甚至将会亲眼目睹世界化的基进转向。前核心(ex-centric)的国家不是正在被“前-后殖民的”(ex-post-colonized)、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预先殖民(pre-colonized)吗？如今，中国正在插手欧洲事务，宣称要防止欧洲危机的同时也在保护自己的投资布局；中国在拥抱欧洲的同时，也在保护自己。这，也是世界化。

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不论古典社会学是否发曾经发展出方法论世界主义的概念，当代盛行的方法论国族主义遮蔽了北方和南方的社会学，无视于这个年代正在世界化的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这种国族主义的凝视：一块领土，一本护照，单一认同，是一种世俗版本的三位一体。所以国族主义观点下的社会不平等是颠倒过来的，其对不平等的关怀止于国家边界；没错，社会

不平等是很严重，但那都是其它国家的情形；它最多激起我们内心里一时的愤怒，但政治上可以毫无作为。

国家边界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画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线，政治上彼此无关，不平等也彼此不相干。合法的制度性力量依赖于国内社会的不平等，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则不见踪影。全球不平等的合法化奠基在一个制度性化的他者观点。例如，生活在欧洲，国族主义凝视可以完全无视于全球其它人的苦难。这样的运作是一种双重的排除过程：排除那些已经被排除的。这确实让人惊讶！全球不平等被牢固地合法化了；这个合法性建立在在民族国家之间对于不平等的默示同意上，也建立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学——一种价值无涉的社会学——之上。

Raewyn Connell说：“想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方法就是去研究其它非欧洲的思想。”这我不同意。为了掌握构成当今世界的现代性拼图，我们要找到一个可以整合“后南方”与“后北方”的理论框架。这不是说要去寻找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上帝之眼，而是，不论它是在法国、澳洲、日本、印度、南非、或任何其它地方，要去为日常生活周遭的社会学问题找出实际的解答：要怎么研究这个已经被世界化的复杂世界？

话说回来，这就是世界主义社会学的全貌了吗？至于批判和目标呢？不完全的世界化是否会导致维持现状、为全球治理性背书呢？或是世界主义社会学可以激发出批判的能量？可不可以变成一种批判、自我反身的世界主义(复数!)？答案是可以的，绝对可以。不过这又是另外的主题了。

Raewyn, 谢谢你的书单。■

全球连结计划：把社会学和社会运动者串连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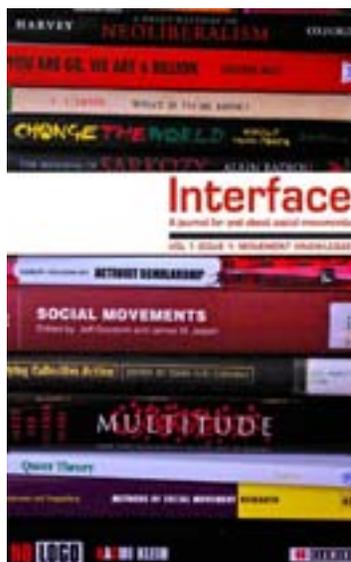
Ana Lucia Paz Rueda · Icesi University

“Interface: A Journal for and about Social Movements”是一份开放的多国语言期刊，目的是试图在运动者和学院之间搭起一座国际对话的桥梁，并跨越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隔阂，超越运动和学科之间的藩篱。这样的创举是由一些学者和社运人士发起的，因为他们发现既有的社会运动相关的期刊试图透过以下两种方式和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第一，学者理论的关怀对

(文接第16頁)

(文接全球連結計畫)

于研究对象(社会运动)而言并不总是那么有用,也不是那么相同。同时,社运也在生产知识,透过网站或其它媒体得以传播开来,并且通常聚焦在很特定的议题上,然而这些对于不同政治文化脉络下的其它运动而言,并不适用。Interface的编辑想把这两个知识生产来源结合在一起,跨越现有的全球对话鸿沟(请见Flesher Fominaya, Issue 1)。我们之前就在构想一个群体编辑的组织——一个可以反映出我们全球性期待的结构。因此这也酝酿了2年的时间来完成。我们除了是想象上的共同体之外,其中的几位仍是素未谋面,而且我们也没有金钱资助的来源。这份期刊的编辑方式有两大特色:其一,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集体编辑组织,在每个地区有半自主性的一组人,包括1到3位的编辑。这些分散各地的代表群体会负责当地的稿件业务,并且我们期待与投稿人的工作关系是相互理解与支持的模式。其二,我们的同侪审查是非一般性的,意即我们同时从运动和学术这两个角度去审查文章。理论上这应该分别由一位运动者与一位学者来审,但是实际上这两个角度的意见来自同一个人,因为我们要求审稿人要



Interface第一期
(Elizabeth Humphrys攝)

同时提供实践与学术的审查意见。我们努力地想要照顾到这两类读者,并超越特殊的运动或议题的狭隘疆界。每一期的主题由主编的特定关怀而定,而每一位编辑轮流当主编,负责规划当期内容。

2009年我们初试啼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运知识、公民社会与运动、危机与革命、运动与另类媒体等议题的文章。最新一期的内容将会包括镇压与社会,以及女性主义运动。此外我们也欢迎所有非主题性的文章来投稿。截至目前为主已经有一般性文章、运动者访谈、主编的话、行动笔记、关键记录、辩论、书评、文献回顾等形式,并且以6种语言发表。作者来自于世界各地,包括了安哥拉、阿根廷、奥地利、巴西、英国、加拿大、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拉脱维亚、墨西哥、挪威、巴勒斯坦、葡萄牙、俄国、南非、南韩、西班牙、瑞典、泰国、美国、委内瑞拉。从2010年3月起我们开始有网站

了,有130个国家的读者曾经造访过。欢迎所有人的莅临: www.interfacejournal.net。 ■

(文接多元普世主義,第13頁)

México)向大家说明了墨西哥原住民农业和药物之间有趣的关系。

Foucault的知识/权力观点也没有在此次会议中缺席。我指出了中东大学系统与在地知识生产系统如何形塑了菁英;在中东,大学总是把菁英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国际社群很活跃、却在当地默默无闻的菁英,另一种是在当地很活跃、却在国际上没无闻的菁英。我认为,为了连结地方与世界,对话和文化之间的转译扮演着重要角色:透过和国际学者对话使自己的理论有普遍性;透过与在地学者对话使自己的研究有相关性。Pablo Kreimer (Quilmes National University, 阿根廷)也阐释了类似的全球一地方的困境。他以拉美的STS研究为例,在“边陲但全球化”的城市里,镶嵌在国际场域中的科学文化和地方知识总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宣称中立的实验室里和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中,也是如此:人们可以对科学的结果和影响产生怀疑,但却不容许对科学的认识论预设提出质疑。

Cláudio Costa Pinheiro (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istory, Rio de Janeiro)用两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说明知识/权力的复杂纠葛。第一个例子是法国人口学家Alfred Sauvy的概念:“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是在1951年巴西首先被发明出来,并发表在巴西知名的期刊上,然而却在法国的著名杂志Observateur上出现后才成为普世皆晓的用语。它原本的意义反映了北方(理论发明者)和南方(理论消费者)的分裂,但如今此意已经不复存在了。第二个例子是依赖理论。此理论可以从巴西扩散到全世界,然而,对于北方来说这个强而有力的智识运动却是一种意识型态。

总之,这场会议很精彩,也很刺激,所辩论的议题都是ISA所提出的全球社会学中的核心关怀。我们很愿意继续把它做好,并注意邻近学科的相关讨论。 ■